

W U 吴

Z H O N G 忠

Y U 与

L I N G 灵

Z H O U 州

# 吴忠与灵州

本书编委会 编

# 吴忠与灵州

本书编委会 编

WUZHONGYULINGZH

大唐故永平郡屈氏夫人墓志铭并序

夫人先君沛润，以声华双美，词翰两全。为将，怀军旅之谋；在公，有处理之策。百战百胜，有戎有克。元戎藉能，补充朔方节度左街兵马使。贤夫张自谨，身继棘门，备诸戎旅，功勤奉上，劳效益彰，干用可称，莫不谈德。节使补充衙前度候，昨蒙改职，兼委重寄。夫人怀令淑之德，著婉顺之姿，内称贤行，外备礼仪。六亲所仰，九族成依。冀保遐年，显于荣寿。不幸，以太和四年七月六日，终于灵州私第，享年五十有七。亲族络绎，惋惜同词。其年十月十四日，殒于回乐县东原。礼也。内外痛悼，骨肉咸哀。长男叔向，次子叔舟，并女侄等，皆号天泣血，痛彻五情。恐陵谷有变，刻石存记，用述不朽。其铭曰：阴阳时亏，神理无察；祸降私门，贤德反札；仁和沉泥，嗣子泣血；贤夫断肠，举家摧绝。天河（何）不佑？神何不灵？哀哉旧里，□□新堂；悲夫郊野，玉山将倾；书之五代，殒石显名。

摄回县尉试家令寺丞吴陟撰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

吴忠与灵州 / 《吴忠与灵州》编委会编.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5. 12  
ISBN 7-227-03092-X

I. 吴... II. 吴... III. 吴忠市—地方史  
IV. K29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55862号

吴忠与灵州

本书编委会 编

责任编辑 李颖霞 周庆鹏  
装帧设计 吴海燕 赵 倩【小狼工作室: 0951-5012113】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印刷装订 宁夏美利科技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5045311  
邮 编 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rs@public.yc.nx.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mm 1 / 16  
印 张 43.25  
字 数 804千  
版 次 2006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册  
书 号 ISBN 7-227-03092-X / D · 199  
定 价 186.00元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吴忠与灵州》编委会名单

- 总策划 肖云刚 吴玉才 马三保 马英杰  
顾问 杨森翔 魏 锦 马宇桢  
主任 马英杰  
副主任 贺彩霞 侯 境  
委员 吴忠礼 鲁人勇 钟 侃 牛达生  
白述礼 胡迅雷 罗 丰 李进增  
朱存世 陈永中 王 慧  
特邀编委 蒋梦熊 张树彬  
特邀编务 蒋梦熊 张树彬

## 《吴忠与灵州》编辑组

- 出版统筹 哈若蕙  
责任编辑 李颖霞 周庆鹏  
特邀编审 杨森翔 蒋梦雄  
书名题字 郑歌平  
图片提供 宁夏博物馆  
宁夏考古研究所  
吴忠市文物所  
何献军 黄国斌 牟 将 张晓宇  
杨森翔 王宗义

# 序一

◎马启智

宁夏是历史悠久的多民族聚居区，其北部黄河以东（今吴忠市利通区和灵武市平原）一带，是历史上开发最早的引黄灌溉区域。汉惠帝四年（前191年）置县的古灵州，就位于此。古灵州地理位置特殊，自置县时起，便为“历代粮仓，军事重镇，交通枢纽，民族乐园”，在宁夏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古代经济不够发达，人口较少，城市规模较小，黄河水浸没等因素，古灵州城址屡有变迁。随着西夏迁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人们关注的焦点开始由河东灵州地区转向河西，加之史书对古灵州城迁址记载不全，古灵州城址所在遂成历史疑案。

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宁夏史学界对古灵州的城址位置、历史沿革、文化传承、社会经济、民俗信仰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尤其是2003年5月，吴忠利通区唐灵州吕氏夫人墓志的出土，为古灵州城址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宁夏史学界掀起了探究古灵州城址之谜的热潮，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短短的两三年，《沧桑灵州》已经内部印行，《吴忠与灵州》也由宁夏人民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发行。这两本著作观点虽有差异，但开启了古灵州研究的大门，对于促进学术繁荣，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开了个好头。

作为一名攻读过历史专业的读者，我对《沧桑灵州》与《吴忠与灵州》学术上的探究与争论感到高兴。一方面，学者们把目光聚焦于古灵州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优势，并以文献考据、实地勘察、民间口碑资料、考古发掘等成就构成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的“证据链”，既拓宽了我们的思路，取证也达到一定深度，为推进我区历史地理及文化研究，发掘和弘扬历史文化底蕴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从双方争论的观点中，我们看到了最终解决问题的希望。争论就是求真，真理越辩越明。双方在争论的过程中做了大量考证、勘察和研究工作，为将来准确界定各时期灵州、尤其是唐代灵州古城址的方位及范围，从而带动对古灵州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吴忠、灵武本一母所生，那母亲便是古灵州。古灵州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内涵，丰富的人文遗产，将为两地开发旅游资源，提升城市品位、推动文化事业发展提供丰厚的给养。希望两地珍惜古灵州文化寻根的历史机遇，齐心协力，密切配合，共同把古灵州这篇历史地理学的大文章做好，为塞上明珠——宁夏再添异彩。

应编者同志之约，聊申浅见，是为序。

## 序二

◎陈育宁

“一石惊天”！随着一方“大唐故东平郡吕氏夫人墓志铭并序”墓志的出土，在宁夏历史和考古学界兴起了一股探讨以古灵州城址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地理研究热潮，这不仅为确认古灵州城址的方位提供了新的实证，而且推动了颇显沉寂的宁夏历史研究出现了新局面。从领导到专家，以至于普通百姓，从区内到区外，众多的人们关心着这一讨论，期待着一个真实的结论，就这一连锁效应而言，着实可喜可贺。

宁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多民族聚居地区，自距今三万年前有人类活动以来，我们的先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开发建设。从商周的西戎到秦汉及其以后的匈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氐、羯、羌，隋唐时期的突厥、吐蕃、吐谷浑、昭武九姓胡人，西夏时期的党项、女真，元代时期的蒙古、回族及后来的清代满族，他们和先后汇聚在这块土地上的华夏——汉族一起，共同绘制出了一幅多民族活动交往的画卷，各民族对宁夏的开发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及西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在这里交汇融合，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多元文化结构，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和历史积淀。

“天下黄河富宁夏”。自秦汉以来，各民族人民利用宁夏黄河沿岸地势平坦、土质良好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开辟了宁夏平原的引黄灌溉。在历史上，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十分重视宁夏引黄灌溉农业的开发，移民开垦和兴修水利是历代王朝经略宁夏的两项传统措施。引黄灌溉的开发有力地改变着宁夏北部的自然景观和社会面貌，是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主体。处于这一地区核心位置的河东——今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及灵武市的平原一带，是历史上开发最早的引黄灌溉区域，在北宋以前是西北举足轻重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之一。

宁夏独特的地理位置构成了南接关陇、北连朔漠、西通西域、与游牧民族区域接壤的特点，因而也成为游牧民族南下的必经之路。富饶的宁夏平原是西北为数不多的粮食生产基地，又有池盐这一重要战略物资出产，使西北少数民族把宁夏作为猎取和控制的首选之地，也是中原王朝拓境斥地、维护政权的用兵前沿。因此，战争也就成了宁夏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内容，既有不同政权、不同民族集团以及王朝更替的战争，包括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也有民族起义和兵变。战争造成了经济衰退、人口剧减，阻碍了历史发展进程；但战争也促使了矛盾的转化，为统一局面的实现创造了条

件。在战争和民族关系的历史演进中，灵州处于秦汉以来就形成的交通枢纽地位，其战略作用和历史影响自然十分重要。许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都与灵州有关。

就宁夏北部而言，在历史上，河东平原的发展早于河西。自秦代在此设富平县以后，至唐代升为灵州，到西夏迁都以前，一直是中原王朝拱卫关中、交通西域、控抚少数民族的核心地区。首先，政治上，它是宁夏北部第一个有行政建制的地区，以秦朝设富平县为标志，此后一直持续未断。同时又是第一个一级行政区治所所在地（东汉设北地郡，以富平为治所）。至唐设灵州，它又成为控制西北少数民族的中心，唐太宗李世民曾在此接受回纥诸部归降，更不能忘记的是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即位于灵州，这是唐室中兴的关键。河西地区虽曾在汉代有过行政建制，但很快湮灭，直到南北朝时期才重新设置。其次，军事上，自秦代蒙恬收复河套之后，历代封建王朝以灵州为核心，依托黄河天堑，构筑军事防线。秦沿河修44座城塞，汉设神泉障、浑怀障，北魏设薄骨律军镇，周、齐设灵州，唐代在这里先建朔方道行军大总督，立朔方军，后设朔方节度使。唐代的边防重点在西北，向外发展的首选方向也在西北，灵州在这两项任务中自始至终起着桥头堡和中继站的作用，“天下劲兵，尽在朔方”，担负着重要的军事重任。西夏以前此地一直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防卫关中的军事前沿和军事设防的重点地区。其三，经济上，宁夏的引黄灌溉始于秦汉，至唐以前，开发的重心是在河东平原，就文献记载的银川平原十条古渠中只有两条在河西平原，余者均在河东平原。自有了引黄灌溉，灵州就成为黄河上游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唐人韦瓘的诗文真实地反映了它的经济状况。其四，河东平原是封建王朝安置归附少数民族的主要区域。自西汉安置匈奴，东汉安置羌，隋唐设置灵州都督府安置突厥、吐谷浑、昭武九姓胡、铁勒、党项等部族，羁縻州县遍布。这里又是多种文化的汇聚地，除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外，这里也明显地受到了江南文化的影响。“塞上江南”之称的出现是由于北周时期曾把大批江南人迁移到灵州，他们带来了江南先进的儒家文化及生产技术、生活理念，他们一方面改变着这里的自然面貌，引水种稻，培植植李，使这里具有江南的景色；同时，重教育、兴科举，浓厚的儒家文化气息使本地的羌胡之俗为之大变，“彬彬然，有江左之风”。故而，河东平原就成为封建王朝经营西北的核心地区，灵州也就成为了塞上名城。

由此看出，位于河东的灵州，在宁夏地区的发展史上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是作为宁夏北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代表而著称于世。随着西夏李德明迁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具有优势主导地位态势的灵州地区逐渐被宁夏河西平原所超越，煊赫一时的灵州逐渐消失于人们的视界之外，加之灵州城址的不断变迁，因而导致了自明代以来人们对唐灵州故址的失忆，也因此成为后人追寻宁夏历史的一个热点。

古灵州城址究竟在何处，自明代迄今，各种文献记载有多种说法。历史地名作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人文现象，是不同地区的人们在不同时代与自然、与社会发生关系及人类之间交往的产物，它往往折射出那个时代所特有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等特征。灵州地名和地址的演变也是如此。汉代设“灵洲”，洲者，水中可居之处。后来改“洲”为“州”，则表示城廓变大，人口增加，不像原始居民点那样容易在小岛上维持，而已成为这一带地方的一个政治中心了。后来又随着黄河游荡的威胁，军事防御的需要，城址屡有迁徙，虽名称未变，而实际地址早已变动。这是历史地理演变中一种普遍的现象，故而在各类记载和人们对灵州故址的探讨中因角度之不同或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各种说法是不足为奇的。

从明代开始，古灵州城址的变迁，迫于流经此地的黄河河道的经常迁徙是一个主要原因，城址已往的遗迹被河水湮没，有的遗迹则因人为的原因破坏殆尽，这些都给灵州古城址的探寻带来了很大困难。尽管如此，解放后，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一些专家学者们不懈研究，越来越多的人提出古灵州城址在今吴忠市利通区境内的判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对各种资料的收集、分析、比较，为这种判断取得了越来越有力的支持。特别是2003年在吴忠市利通区出土的“吕氏夫人墓志铭”，为古灵州城址在今吴忠市利通区提供了新的有力佐证，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应该看到，我们仍无法勾勒出古灵州城址的具体准确的方位和城址轮廓，为古灵州城址所在地的最终判定，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不仅需要等待更为具体的实证资料的发现，更需要现代考古技术的勘测结果。我们相信，终有一天会在充分证据的基础上确定唐代灵州古城的具体方位和城址轮廓。

由昨日之灵州，到今日之吴忠，从其发展脉络的一波三折可以看出，在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轨迹的一个缩影。关于中国古代城市产生的原因，学术界有防御说、集市说、宗教中心说，前两种原因在灵州到吴忠的发展过程中，在不同时期均有明显地表现。自汉代设治至明代灵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其城市功能除了作为行政中心之外，更主要的是作为军事防御的据点，这是由于宁夏北部当时的地理条件和历史环境所决定的，因为战争的需求使灵州更多地具备军事防御支撑点的意义。自明代其城址三迁，已经远离了唐代灵州故址，至清代，虽仍叫灵州，只是符号的延续。而明代在唐灵州故址附近，兴建了一个军事据点，是为吴忠堡，其功能仍是军事防御为主。然而由吴忠堡至吴忠市已是民国至解放后的事，由一个军事据点直接成为行政中心，显然是因近代以来吴忠堡经济繁荣，已成为宁夏河东平原的商贸中心。灵州的军事意义已随着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而消失。经济因素占据了吴忠建市的主导，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

自明代灵州向东北方向三迁其址，其主动因是黄河的“冲激崩圮”，迁徙的位置据



今吴忠市区已有30里的距离，名称仍沿用灵州，后改灵武，依然代表着河东平原地区的行政中心。这个迁徙所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即古灵州已不复辉煌，即使后来在当地有建制，已不再称灵州且位置已偏向西，在金积堡设宁灵厅，后又设金积县，人们已不再把它与古灵州联系在一起了。但作为区域历史文化的象征，古灵州是积淀于今吴忠市的历史遗迹，它在历史上曾起的作用，特别是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灵州所产生的影响，依然是今吴忠和灵武地区可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今日社会文明的进步，离不开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今日这一地区的行政建制有何变化，但作为历史上同一地区所共有的文化资源，都可以充分利用。与千余年前古灵州的辉煌相连接打造新的城市品牌，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城市文明发展的需要，这将使历史的底蕴更具有现实的文化意义。我想随着“大唐故东平郡吕氏夫人墓志铭并序”的出土和对古灵州研究的再度深入，对提升吴忠、灵武等地区的知名度是有重要意义的，近来媒体的报道，领导和学者们的关注，已显现了它所具有的影响力。

由吴忠市政协牵头，借助吴忠利通区“大唐故东平郡吕氏夫人墓志铭并序”的出土，搜集了近20年来专家学者们研究吴忠与灵州历史地理、考古、人物、事件等方面的论著，编成洋洋巨册，诚如编者所云：“是吴忠市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填补了吴忠市历史地理与文化研究的空白”。这部汇集了多位方家二十多年来专题研究成果论著的编辑出版，是数十年来吴忠、灵武历史文化和历史地理研究成果之集大成，当属近年来宁夏地方史、宁夏历史地理研究领域里具有代表性的成果，确属难能可贵。这对推动宁夏地方史和宁夏历史地理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随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资源整合的需要，随着广大群众对当地历史文化知识了解和利用的需要，也随着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宁夏的历史工作者有责任进一步深入进行对地方史各类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对重大专题的探讨，联合力量，发挥优势，努力取得有标志性的研究成果，打造有地区特色的文化精品。这是一个地区文明程度和文化品位不可缺少的内容。《吴忠与灵州》的出版，在这方面对我们也是有启示的。

2005年3月

# 引言

◎ 杨森翔

经过半年多的紧张筹备，《吴忠与灵州》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这是我市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个基础性工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部书的出版，不仅填补了我国历史地理与文化研究的空白，而且也为我国唐史研究和宁夏地方史研究解决了一道难题：明代以前的灵州城址在哪里？这个困惑了我国历史学界数百年的难题，随着这本书的出版，迎刃而解了。

大家已经知道，古代“灵州”，是塞上历史名城，是古代宁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其址在富庶的“灵洲”（包括今宁夏河东平原及河西的青铜峡市、永宁县、银川市、贺兰县的部分地区）的南部，“枕河”而踞，是唐、五代“灵州道”、“灵州西城道”、“萧关道”、“漠北道”的交会点。但在明代初年，由于正逢黄河的“不安流期”，黄河数次大范围改道，这个“灵州城”被黄河水“冲激崩圮”，被迫“三迁其址”，从“灵洲”的富庶部位搬到了偏僻的“大河东”、“沙山西”，即现在的灵武。而原来的“灵州城”（下文简称古灵州）逐渐远离了人们的记忆，遂成为“千古之谜”。

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他丧失了“历史记忆”，很久以来，就有人顽强地、非常富有智慧地对被黄河水“冲激崩圮”的“古灵州”城址位置作了认真的考证和记载。自从“吴忠”这一地名从历史上出现以后，又及时地把它与“古灵州”联系起来，从而使我们今天能够从前人的文献记载中理清“古灵州”的沿革变迁，遂有了《吴忠与灵州》这部书。

首先明确考察记载古灵州城址位置的，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六子庆王朱栢。朱栢（1378—1438年），系朱元璋与余贵妃所生，13岁时被藩封为庆王，15岁时来到宁夏，先在韦州住了8年，后迁往宁夏府（今银川），在宁夏生活了整整45年，是个地地道道的宁夏通。他在于宣德年间成书的《宁夏志》“属城”一节中，不但清清楚楚地记载了当时的灵州城（即今灵武）系“今之新城，宣德间陈宁阳、海大监奉旨，相度地形，卜沙山西、大河东”所建，而且也记载了被黄河水“冲激崩圮”的古灵州城的位置：“（灵州）故城居大河南，今犹存其颓垣遗址，其西南角被河水冲激崩圮”。又在“古迹”一节中记载：“回乐县，按《舆地广记》，在灵州古城内。天宝末，明皇西狩，太

子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是“古城”一名较早亮相史籍，也是较早明确地把“古城”与回乐县、明以前灵州联系在一起的记载。还在“寺观”一节中说：“兴教寺，古弥陀寺也。洪武间僧撈本即重修。永乐间奉敕改今名。在黄河南，今(应为“古”字之误——笔者)灵州城西。”“石佛寺，古胜佛寺也。洪武间僧屠居耳著重修，在兴教寺东，古灵州城上。”这是我们看到的关于被河水冲毁后的古灵州城址方位的最早记载——这时，“吴忠”一名尚未出现，但，朱梅对“大河南”、“古城”、“兴教寺”、“石佛寺”(胜佛寺)与古灵州城址关系的记载，已为“古灵州城址在吴忠”埋下了智慧的伏笔。

随后，明人胡汝砺、管律等人的《嘉靖宁夏新志》，不但基本原封不动地重复了朱梅的记载，而且还新记了“吴忠”的始建年代(嘉靖六年，1527年)和得名原因。从而，使“吴忠”与“古灵州”的名称第一次同时出现在同一本书上。

最早将吴忠与古灵州城址联系在一起的，是明清两代的“吴忠堡”的建设者们，他们在修建吴忠堡时，在堡内最重要的地段修建或保留了“旧回乐县衙”及“古回乐”的牌楼，而这个重要的“历史记忆”被1939年后、1943年以前绘制的《清末民国吴忠堡略图》清晰地保存了下来。我们知道，唐代回乐县是唐灵州州治所在。吴忠堡是在唐回乐县旧址(古城)附近修建的，毫无疑问，唐肃宗登基的那个“灵州城址”肯定也在吴忠。这与历代文献记载、民间口碑资料及“古城”这个地名所透露出的历史文化信息完全吻合。只是当时的吴忠，仅是灵武辖下的“一十三堡”之一，其地位和知名度都不及今灵武，所以，明清以来的各种文献，在提到“古灵州”时，大都以今灵武为参照，只指其在“今灵武西南”，而少言“今吴忠”。新中国成立以后，吴忠的地位虽然上升，但其知名度仍然有限，在“思维定式”的影响下，一些学者仍沿用“今灵武西南”说，时间一久，便给后人造成了短暂的历史“失忆”，使原本清晰的历史脉络又变得“扑朔迷离”。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部分历史地理学者经过艰辛考证，重又得出明确结论，古灵州城址就在今天的吴忠，并郑重建议将“今灵武西南”说改为“今吴忠”说。他们在《宁夏历史地理考》中指出：“今人根据清代、民国年间的历史著述去考证宋代以前的灵州城，经常沿用‘在灵武西南’的说法。殊不知在清朝、近代只有灵州或灵武县，吴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增设的建置。过去说‘灵武西南’无误，而今天再沿用就不够准确了。”2003年，吴忠市实行“北扩西移、吴青对接”的大规模城市建设。这个决策，不但翻开了吴忠城市建设的新篇章，而且也翻开了吴忠历史地理与文化研究的新篇章。450多万平方米唐代墓葬群及唐灵州“吕氏夫人墓志”的发掘和出土，又一次引发了人们对“唐肃宗登基的古灵州城址究竟在哪里”的大讨论。这次讨论的成果，不但进一步确定了明代以前的古灵州城址就在今天的吴忠，唤醒了吴忠的历史记忆，接通了吴忠的地方文脉，而且也奠定了《吴忠与灵州》这部书稿的基本框架和作者阵容。

《吴忠与灵州》的基本框架由“考古考证”、“历史大事”、“人物宦迹”、“文物文化”、“新闻报道”、“文物集粹”以及“附录”诸篇组成，汇集了当今宁夏历史地理、地方史志研究与考古学界的权威专家和学者发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类文章及图片。是目前我市乃至宁夏在专题研究中作者人数最多、阵容最强大，部类最齐全、也最具权威性的成果资料汇集。

这部书围绕“吴忠与灵州”这一主题，重点考证并最终确认了上述“明代以前的灵州城址在今吴忠市”及其沿革变迁、历史大事、名人宦迹、文化文物，并体现出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古灵州城址在吴忠”的结论，是由一系列证据所形成的“证据链”证明了的。**

考证“明代以前的灵州城址在哪里”的关键是证据。常识告诉我们，证据又分“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直接证据的证明力最强：只要有一个，就能一锤定音；而间接证据必须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证据链，才能达到与直接证据同等效力的证明力，否则就是“孤证”；而“孤证”是不能成为定案的依据的。更不用说那些本身尚需用事实（考古发掘）来证明的未成定论的参考图籍之类。在“明代以前的灵州城址在哪里”这个问题中，只有古灵州“城址遗迹”是最直接的证据，只要找到“城址遗迹”这一个直接证据，就可以确定古灵州城址的具体位置。但是，由于岁月的销蚀、黄河水的冲激，再加上人为的破坏，这个“遗迹”恐怕是找不到了。于是专家学者们便把寻找“证据链”做为考证的重点。通过数十年艰苦细致的考证和考古，这个“证据链”终于形成，这就是：文献记载（《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括地志》《宣德宁夏志》《嘉靖宁夏新志》……等各类文献中关于古灵州、古回乐与相邻州县、山川地理相对位置的记载及对其中互相矛盾的记载进行笺证考释）——民间口碑资料（当地老故耆旧关于“古城”、“古回乐”的回忆实录）——实地考察（专家们关于历代黄河故道的运行轨迹及吴忠地上遗留物的考察）——考古发掘（吴忠城区规模庞大的汉唐墓葬群的发现及发掘）……这个“证据链”环环紧扣、逻辑严密、天衣无缝。尤其是从吴忠古城街道办事处金星村附近的“绿地园”工地唐墓中发掘出土的唐灵州“吕氏夫人墓志”，更是“一石惊天”（自治区主席马启智和考古专家钟侃语），一语破的，一锤定音：吕氏夫人于“太和四年（830年）七月六日，终于灵州私第，……其年十月十四日，殁于回乐县东原”——我们知道，唐代回乐县与灵州同址而治——这个被考古学者称为“毋须讨论”和“毋庸置疑”的接近于“直接证据”的墓志铭文，沉埋于地下一千多年，从未被人移动过一步，这其中透露出的确切的历史文化信息和史证价值，任凭善辩者浑身上下都长满了嘴，也无法抹煞。正是这块墓志加上其他证据链，构成了唐灵州城址在吴忠的铁证。

**第二，古代吴忠的自然环境、“灵州城”的地理基础及文化生成。**

早在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就对吴忠关马湖汉墓群进行了发掘清理，出土了

大量有价值的文物，到了八九十年代，这里又有新的汉墓被发掘和清理，又出土了一批非常有价值的文物。而且沿关马湖（实际上是关家湖、马家湖的合称）、高闸、黄沙窝、海子、狼皮子梁……一线，也有零星汉代文物出土。比如著名的铜质飞鸟、飞马、料珠等就出土于黄沙窝。所以，一些专家学者据此认为，汉代富平县址在关马湖和金积之间；而在北魏时已经断流的黄河“东枝”（又称“枝津”）故河道即与吴忠东南“山边子”平行的关马湖——黄沙窝——海子——狼皮子梁——安家湖……一线，与故河道在今河西青铜峡市莲湖——永宁县增岗——银川72连湖及西湖——贺兰县常信——陶乐南一线的黄河主河道“西河”构成了东西宽30公里、南北长90公里、总面积达2700平方公里的天下奇观“灵洲”（又曰“河奇”），包括了今吴忠、灵武灌区的全部及青铜峡、永宁、银川的大部（参阅本书附录1：《北魏以前“西河”、“东枝”流向示意图》）。正是这个面积广大、水草丰美而又“饶畜多谷”的“灵洲”，成就了始建于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的历史名城灵州及灵州平原的辉煌。

古代吴忠（古灵州）平原，气候温和湿润，水草丰茂，植被覆盖率极高。土壤中腐殖质层厚而含量高，土质结构疏松，非常适合使用石质或木质等原始生产工具的古代人类开垦耕种。作为华夏文化主体的汉文化，最先发祥于黄河中游的黄土谷地。作为黄土高原向鄂尔多斯台地过渡段的古代灵州平原，不但具有这种适宜于农耕的条件，而且还有适宜于放牧的自然环境。流经古灵州大地的“西河”和“东枝”，既给灵州平原带来了充沛的水利资源，为生成水草丰茂、“早稻嘉鱼同登利”的“塞北江南”美丽风光提供了条件，也成为灵州早期城市定位的地理基础。

环境对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和文化形态的生成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史上的吴忠、灵武（含今河西青铜峡、永宁、银川的部分）地区，是天然的农牧之地，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在这里交融碰撞，各民族在这里共生共荣；古灵州，得山川形便之利，早在“水洞沟”时期，就有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汇；随着历史的演进，这里又成了“关中屏蔽”和“水旱码头”，一次次的多民族驻足，一次次的军旗猎猎、战火硝烟，一队队的商贾、僧侣和使者的驼队、船队……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激起和闪过一簇又一簇耀眼的浪花。灵州介于关中与塞外的重要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文化交流和传播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吴忠大地出土的大量文物和现存古迹，是历史上中西文化传播与交融过程中的结晶。

### 第三，吴忠地区是宁夏最早进行农业开发的地区，是“塞上江南”的祖生地。

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历史上的秦汉时期，中央王朝便对吴忠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屯垦和兴修水利。以后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吴忠地区的引黄开发。因此移民和兴修水利便成为历代王朝经略吴忠、宁夏的两项传统措施，水利的兴衰也成为吴忠及宁夏地区政局治乱的首要标志。正是这种连续不断的移民和引黄开发，加上吴忠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这里便成了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人称“天下粮仓”。因此，早在五代时期就被誉为“塞北(上)江南”，唐代诗人韦缙的名句：“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正是这种历史事实的真实写照。后人所谓“天下黄河富宁夏”，最初也就是富在吴忠即古灵州灌区。在农业的推动下，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和其他各业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黄河以及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成了维系各民族交往的天然纽带，吴忠地区也成为各民族共生共荣的“民族乐园”，是古代宁夏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第四，吴忠的历史记忆，是由“富平——灵州——薄骨律镇——普乐郡——回乐县——灵武郡——西平府——翔庆军——古城”等一连串历史曾用名和文物古迹构成的，是中华文化“和为贵”思想的地理折射。**

吴忠的历史曾用名，内涵丰富而深刻。秦代富平县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包容着浓厚的军事色彩，也寄寓着人民企盼富裕与和平的文化思想。同时，也是当时吴忠地区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写照。灵州的称谓反映了“灵洲”这块“河中可居之地……随水高下，未尝淹没”的地理特点，是地理结构上的中华文明，其实质是对和平、安宁与幸福的企盼，是“和为贵”思想的地理折射。由薄骨律镇到普乐郡、回乐县、灵武郡、西平府、翔庆军的演变，不但仍然一成不变地反映了中华文化“和为贵”、和平与安宁的固有内涵，而且还寄寓着各民族及其文化的交汇融合，实质上也反映了古灵州历史地理位置的重要。由“富平”……到“古城”的称谓演变，既包含了黄河对古代灵州的深刻影响（“成亦黄河，败亦黄河”），同时也包含了黄河对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

**第五，吴忠自古就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其历史文化多元多彩。**

吴忠、灵武地区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和气候差异很大，各种经济类型都能在这里找到合适的生成条件，因而自古以来就出现多种文化类型。据考古发现，灵武水洞沟文化遗址自身就呈现出多元多彩的特点，以至于有的学者把它归于河套文化，有的又把它单提独列，称为“水洞沟文化”；而且还呈现出中西交往、亦中亦西的特点。远在数千年前，各民族就在吴忠大地或耕或牧，其中以响衍戎和义渠戎最有代表性。先秦以降，响衍、富平、响卷政权的建立，特别是灵州析置以后，交通通达，已成为中原政权在边地的重镇，奠定了灵州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除了大批的汉族农民由内地迁入屯垦外，内附的匈奴人也被安置于安定郡三水县(今同心境内)，设安定国，保留各自的生产和生活习俗。近年来在吴忠、同心、中宁、青铜峡发现的匈奴墓葬也显示了这种多元文化的融汇：既有“安逐水草，习射猎”的游牧文化；也有“城郭之可守，撻书之为利，田土之可耕，赋税之可纳，婚姻仕进之可荣”的城邦农耕文化，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期，灵州也是这个融合期的重要舞台，匈奴、羯、氐、羌以及鲜卑(拓跋部)、柔然等族成员，都先后进入灵州地区，与原

有的民族互相融合，共同组成了新的民族家园。这种融合的事实也反映在当时灵州地区的山川及城市命名上，如达乐山(今罗山)、安乐州(今韦州)、薄骨律镇(今吴忠)、普乐郡(今吴忠)、回乐县(今吴忠)等等。到了唐代，随着中原政权的强盛，这里更发生了名垂后世的重大历史事件(唐太宗灵州勒石受降、唐肃宗灵武登基称帝)。宋、西夏及蒙元时期，吴忠地区的农、牧、工、商、水利及佛、儒、道、回诸教更呈现出千姿百态、风格各异的多元特色。这种特色不仅见于各种文献记载，而且也体现在今天吴忠大地上的重要历史遗留，如秦渠、汉渠、兴教寺、石佛寺、特赐寺(俗称太子寺)、津梁寺(民间讹为“清凉寺”)等以及民俗谚语中。

#### **第六，吴忠地区是古代宁夏的军事重镇，其历史文化具有明显的军事特征。**

吴忠地区历史上是少数民族和屯田驻军聚集的地方，这里发生过多次起义和兵变，历代战乱不断。东汉羌人的三次起义、富平三迁；隋末灵州白瑜娑起义；唐代梁师都、仆固怀恩的叛乱，以及不同时代不同政权、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构成了吴忠地区古代历史的一个主要内容。与其相伴相生的历史文化，具有明显的军事特征。从早期的《诗经·小雅》到《采薇》、《出车》到汉代的《小麦谣》、唐太宗李世民的《灵州勒石诗》、《饮马长城窟行》、杜甫的《送灵州李判官》、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宋张舜民的《西征》……无不是对历朝征战与军事活动的记述和描写。

#### **第七，吴忠地区是古代宁夏的政治、经济中心，是中原与西北相连的交通枢纽。**

一部宁夏古代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古代灵州史。宁夏古代历史上发生的若干重大事件几乎全部发生在灵州：州、县政权的较早设置，黄河农业的开发，内地大量移民的屯垦，历代帝王的巡视和驻跸，……使灵州(吴灵)平原很早以前就成为宁夏乃至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周围地区具有极大的辐射力、拉动力和吸引力。灵州自古以来就内接中原，西通西域，北连大漠，是中原与西北相连的交通枢纽，水陆交通四通八达，这种地理位置和历史作用使灵州地区成为宁夏历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主体和核心，同时也是西北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

#### **第八，本书的特点：求大同存小异，在承认明以前灵州城址在吴忠的前提下，其具体表述又略有歧异。**

有四句哲人名言不能不提：真理不讲情面；事实胜于雄辩；知识就是力量；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历史地理是科学；科学是实事求是的学问；实事求是就不可能照顾感情问题。在探讨“明代以前的灵州城址在哪里”的过程中，很多人(尤其是灵武籍以及过去曾持不同观点的同志)都经历过一番“感情”的折磨，但最终还是承认了事实，服膺了真理。这是需要勇气的。

由于这部书的作者来自不同的学术领域和单位，所掌握的资料和信息各有侧重；文章发表的时间有前有后，相距数十年甚至20年以上，因而在考证“明代以前的灵州城址

在哪里”时，虽然都得出了“在今吴忠”的结论，但在具体表述时又略有歧异。鲁人勇、吴忠礼、徐庄的《宁夏历史地理考》由于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那时的吴忠市城区很小，今天已成为吴忠市区一部分的“古城街道办事处”当时还叫“古城公社”或“古城乡”，是吴忠市的西北郊。因而，他们在表述“明以前灵州城址在哪里”时用了“今吴忠西北”说；白述礼、陈永中、朱克辛等同志则用了“今吴忠早元、古城、东塔一带”说；而朱存世的文章因写于2004年12月，这时的吴忠城区已实现了“北扩西移”，正准备“吴、青对接”，所以，他采用了“今吴忠市西”说；还有的同志用了“今陈袁滩”、“双墩子”等等不同说法。这种表述上的歧异，在“直接证据”——明以前灵州城遗址——没有被发现以前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的表现。其实，“陈袁滩”、“双墩子”、“早元”、“东塔”也者，正是“今吴忠市西北”的外延，是绵延数十里的古城湾(有的就是古城湾的一部分)的毗邻村镇。

另外，关于“西河”、“上河”、“东枝(枝津)”及“灵洲(河奇)”的表述，也有歧异：一部分学者认为，“东枝(枝津)”是北魏以前对一出青铜峡口“枝分东出”的一条黄河支流的称呼——其流行轨迹与今吴忠、灵武东南的“山边子”(即鄂尔多斯台地西南缘)平行——它与当时的“西河(上河)”(即流经青铜峡莲湖——银川西湖一线的黄河主河道)共同造就了总面积约2700平方公里的河中可居之地“灵洲(河奇)”，至北魏时期已经断流、不复存在；那片面积硕大而神奇的“灵洲(河奇)”也与东南面的台地连成一片，因而也不存在了。因此，北魏后从其他地方分流出的黄河叉河不应再称为“枝津(东枝)”；叉河中的小洲渚也不是原来的“灵洲(河奇)”。但也有同志“爱屋及乌”，舍不得旧名，把唐宋元明清各时期的黄河叉河(支流)仍称为“东枝(枝津)”，把已经改道的黄河主河道仍称为“上河(西河)”，把面积小到数平方公里或数十平方公里、已经不能再建任何城池的河中滩渚，仍叫做“灵洲(河奇)”。这种歧异当然也有个“正误”、“是非”问题。只是，在条件尚不具备时，不急于求同。相信，随着讨论的深入，认识会达到最终的统一。

### **第九，吴忠、灵武自古是一家，拥有一部共同的历史。“资源共享、文化共建，联手打造吴灵区域文化”是正确的选择。**

吴忠历史地理与文化的研究，以《吴忠与灵州》的出版为标志，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不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确地了解并向广大群众普及这方面的知识，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无论从山川形便、历史文化的角度，还是从历代行政施政、建置沿革的角度，吴忠、灵武自古是一家：生活在同一个地理单元——灵洲；接受同一个地方行政——古灵州历代政权的领导；享有一连串共同的历史曾用名——灵州、薄骨律镇、普乐郡、回乐县、灵武郡、西平府、翔庆军；拥有一部共同的古代史——古代灵州和回乐



的历史。无论是从解放前的“吴忠归属灵武”，还是从解放后的“灵武归属吴忠（银南地区）”，吴忠、灵武自古是“一家人”：山川同城、历史同源、血脉相连，真正是“将两个泥人摔碎，着水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即使现在灵武划归银川代管，这种历史的亲缘关系也不可能割断，更不能抹煞。当然，对于先人留下的历史文化资源谁也不能垄断。正确的选择应该是“资源共享，文化共建，联手打造新的吴灵区域文化”。事实上，我们这本书已经体现了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要进一步加深对建设区域文化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把建设区域文化推向深入。

在现代社会，经济信息的交流、传播都是与文化信息和文化交流融合在一起的。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客观上讲，与文化建设息息相关。现代社会的经济运作和经济活动，不仅需要高科技等技术层面的支持，更需要文化的支持。“文化是城市的精神支撑”，没有文化的支持，就没有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这话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城市文化又不是孤立的，它总是和一定的区域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对于吴忠和灵武，更是如此。在当前打造区域文化、塑造城市精神的进程中，吴忠与灵武在文化资源的共享、文化工作的合作方面，具有很好的共建、共享、共荣的基础。两市文化（含旅游）工作者应该密切联系和交流，使得文化工作的合作进一步规范化、经常化，催生吴灵地区成为宁夏区域文化合作的典范。